



面向 21 世纪 课 程 教 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 国 历 史

先秦卷

主编 张岂之

本卷主编 刘宝才 钱 逊 周苏平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历史

先秦卷

主编 张岂之

本卷主编 刘宝才 钱 逊 周苏平

编者 刘宝才 钱 逊 周苏平 廖名春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F62/21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历史学科“九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全套书共六卷。本书为第一卷——先秦卷,在内容方面,重点写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古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发端、中华学术文化的起源;在体例方面,放弃了以社会形态为题分编分章的作法,尽量以中国先秦历史的概念术语作编和章节题目。作者还从对先秦历史的总体认识出发有选择地反映了新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本书资料翔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文字流畅。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先秦卷/主编张岂之;本卷主编刘宝才、钱逊、周苏平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ISBN 7-04-008894-0

I. 中… II. ①张…②刘…③钱…④周…

III. ①中国—历史②中国—古代史—先秦时代(前 221 年) IV. 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695 号

中国历史·先秦卷

主编 张岂之 本卷主编 刘宝才 钱逊 周苏平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1.5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0 000

定 价 18.3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
国家级重点教材

总 序

—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要撰著一种新的中国通史，并探讨了这种通史的体例和方法。此后，相继出现了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穆的《国史大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代表性著作。这些通史之作各有特点，为中国史学研究和史学教学作出了贡献。

1994年初，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高教司提出重新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任务，并指出教材建设是面向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内容、方法改革中的重要一环。高教司要求我们：（1）将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系统而精练地吸收进新的教材中。几十年来关于专题史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不少科学成果；在断代史方面有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出版，考古学方面也有很多发现。所有这些均需在新编的中国历史教材中得到反映。（2）时代和读者对中国历史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吸取历史的经验。（3）原有通史之作在体例上存在一些不足，新的中国历史教材有可能探索出一种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熔于一炉的编著体例。

新的中国历史教材编写的目的有三：（1）向大学生、特别是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介绍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过程。（2）向大学生和研究生介绍中国历史上关于国家行政制度、社会管理、经济管理、文化政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3）结合爱国主义教育，深化并探索文科教材的编著方法。

新的中国历史教材在写法上力求遵循以下六条原则：（1）朝代更替和历史事件相结合：将历史发展的脉络大体叙述清楚，为此可使用适当的图表。（2）制度与人物活动相结合：既叙事又记人，记人侧重在政治、制度、管理以及科学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3）文化与社会生活相结合：通过文化反映每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4）注重中国历史重要内容的前后关系，做到前

后呼应。(5)叙述务必基于准确的材料,依据具有科学性同时又为学术界所公认的成果,文字叙述简洁明白。(6)全书体例保持一致。

新的中国历史教材主要内容有七个方面:(1)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2)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活动。(3)历代国家行政制度、施政方式与措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消长以及处理经验。(4)历代关于农业、工商业的基本政策、管理方式和实际效果。(5)历代国家的人才培养、教育体制以及官吏选拔制度。(6)历代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处理及经验。(7)历代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状况。

二

这部中国历史教材是由几所重点大学历史系学者集体编著的,共分六卷: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卷;元明清卷;晚清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1994年夏,经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同意,聘请了各分卷主编。在文科处的组织指导下,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会上,我归纳大家的意见,写出《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意见》,并请有关专家审阅各分卷主编草拟的编写大纲,进行了修改补充。这样,各分卷主编即可组织力量进行编写工作。

编写工作用了近四年时间。原来设想编写进度能够稍快些,但是一开始工作,大家便觉得需要用较充分的时间去研读有关学术成果,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动笔。初稿写出后,各分卷主编将稿交给我。我是第一个读者,是第一个学习教材的学生。我边作读稿笔记,边提出修改意见。当这些意见反馈到分卷主编那里,他们再加以研究,然后对初稿进行修改。修改毕,打印出来,每卷都邀请两三位专家认真审稿。他们对材料、论点、文字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评审。这个过程稍长些。我又将专家的审稿意见进行归纳分类,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反馈给各分卷主编。这样,分卷主编又根据专家的意见对书稿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有些地方是重写)。这次改稿毕,我再次审读,然后交高等教育出版社审处。

现在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部教材的分量较大。大学历史、中文、哲学和社会科学各系的同学选读“中国历史”课,是读不完这部教材的。他们可以选择其中若干章节去读。这部教材力求完整一些,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将使用面适当扩大些。文科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朋友也可以用作参考书;而讲授中国历史的教师亦可参考这部教材,有选择地加以使用,从而写出他们自己的教案。将来我们准备补做一件工作:将六卷本的《中国历史》教材缩写成两卷,60万字左右。这样,大学文科本科生读起来会更加方便些。

这部教材的编写始终得到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的指导和支持，这是教材编写工作得以完成的一个重要条件。编写工作还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政史法编辑室的大力帮助，这里也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部教材将来在高校文科试用时，老师和同学们肯定会发现其中不足。我和各分卷主编衷心希望能听到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以便于我们在将来再对这部教材加以修订。

张岂之

2000年3月于北京

前 言

一、中国古文明与世界古文明

人类历史已有约 200 万年，在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依靠现成的自然物生存，过着采集渔猎生活。距今约 1 万年前，才出现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构成文明发生的前提。距今五六千年前，才出现了最早的人类文明。

在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到，北纬 20 度至北纬 40 度与东经 20 度至东经 120 度之间是一片巨大的扇面形陆地。人类古文明发祥地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和希腊都在这片陆地上。

埃及和两河流域古文明发源最早。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代后半期，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已有象形文字，形成数十个早期国家诺姆国。公元前 2000 年代后半期，古王朝统一埃及，著名的金字塔就是这个时期建造的。公元前 2000 年代末至公元前 1000 年代早期的中王朝时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 2000 年代末至公元 1000 年代前半的后期进入铁器时代。两河流域古文明发源的乌鲁克时期也在公元前 3000 年代后半期。那时两河流域出现了图画文字。接着在捷姆达迭特—那色时期（公元前 3100 年至公元前 2700 年）形成早期国家。到公元前 2000 年代末的阿卡德时期完成统一，公元前 21 世纪进入青铜时代，在公元前 1000 年代前期亚述帝国统治时期进入铁器时代。

稍晚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发祥地是印度和中国。公元前 2000 年代末至公元前 1000 年代初，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开始使用文字，出现城市国家，至公元前 11 世纪起进入铁器时代。中国古文明起源的黄帝时代，在考古学的龙山文化时期内。公元前 21 世纪建立起夏代国家。青铜使用始于夏代以前，而铁器普遍使用则迟至战国时代。商代的甲骨文被认为是已知的最早中国文字。但有许多迹象表明，对中国古文明现有的认识可能要被突破。

古希腊文明是古希腊人吸取埃及和西亚古文化创造的。古希腊的爱琴文明（公元前 20 世纪至公元前 12 世纪）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在克里特岛和希腊半

岛南部出现城市国家。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开始使用铁器。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城市国家普遍形成。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城市国家由极盛走向衰落。接着，古希腊经历了马其顿帝国统治时期（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于公元前146年亡于罗马帝国。

古希腊文明出现的历史、地理条件较为特殊，而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古文明有许多共同点：

第一，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古文明都是本地区居民创造的。上古时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人类交往范围狭小，各地区人类社会都是独立发展而极少受到外来影响。各个地区人类社会独立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便出现几个最早的文明。因此，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古文明是中国人类社会独立发展的结果。

第二，人类古文明有共同的发展趋向。各古文明大致都是从分散的早期国家开始，经过地区性国家，走向统一帝国。古埃及从早期国家诺姆国开始，经过古王朝、中王朝时期的地区性国家，走向新王朝时期的统一帝国。两河流域从早期众多的城市国家开始，发展为阿卡德王国和巴比伦王国那样的地区性国家，后来统一于亚述帝国。印度经历了哈拉巴文化的早期城市国家、雅利安人的地区性国家，最后建立了统一的孔雀王朝。中国古文明则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发展以及春秋战国的演变，最后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

第三，古文明建立发展的基础是农业。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四个古文明发祥地都有适合农业发展的地理条件。古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没有适合的地理条件很难生存发展。几个古文明发祥地都与河流关系密切，中国古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印度古文明产生于印度河流域；西亚古文明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埃及古文明围绕着尼罗河。所以，历史学家称这些古文明为大河文明。近年我国考古学家进一步探讨，发现农业的发源地并不在平原和三角洲地带，而是在山地和高地边沿。这种认识修正了早期农业必须依靠灌溉的观念，但没有改变早期农业发源于大河流域的事实。

指出古文明的共同点，并不否认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各自的地理环境有重大差别，影响着文明发展过程。埃及西、南两面被沙漠包围，东、北两面濒临大海，使它免受外来势力侵扰。而两河流域西北是小亚细亚，北连高加索，东接伊朗，西邻地中海沿岸，四周强大的外族势力经常入侵，打断两河流域古文明自身发展进程。印度古文明发展几次中断，具体原因虽不很清楚，但不能排除与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古文明的地理舞台——东亚大陆，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它被浩瀚的太平洋、瘴疠丛生的热带雨林、高峻无比的喜马拉雅山和冰川广布的帕米尔高原，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形成与外界隔离的天然屏

障，护卫中国古文明的发展使之不受外来侵扰。只有北面的古代游牧部落常常威胁中原地区，但由于中原经济文化处于优势，中国古文明发展始终没有被打断，发展过程表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和一系列特点。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

古代社会之前，人类经历了氏族社会，中国也不例外。但在古希腊文明史上，早在爱琴文明发源期就已冲破氏族制度，海上殖民活动使那些来源不同的冒险分子结成集团，建立起一个个殖民城市，更加远离了氏族关系。中国的情况不同，文明起源时期氏族组织被保留下来，夏、商、周都是以各自原有的氏族部落为核心建立的王朝。夏为姒姓，商为子姓，周为姬姓，三姓贵族分别为三代统治集团的核心，他们的世系都可以追溯到史前。三代王朝前后相继，而三族从史前以来就在并存发展。三代社会里，统治者保存着自己的氏族组织，氏族首领演变成君王；被统治者也保存着自己的氏族组织，成为国家控制的基层社会单位。周初封给鲁公“殷民六族”，封给康叔“殷民七族”，说明殷人在商代保存着氏族组织，在商代灭亡以后也保存着氏族组织。三代社会都是“氏以别贵贱”，属于不同等级的氏族的成员分别聚族而居，迁徙流动也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并没有因此而拆散氏族组织。氏族组织保存下来，在三代不是特例而是通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才发生变化。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从社会组织侧面来看，可以说是氏族组织演变到消亡的过程。这一特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发生过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所谓“城市国家”，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自己的特点。我国考古工作者已发现多处史前城堡遗址，被视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城堡反映着氏族社会末期的阶级分化和氏族部落之间冲突的激化，但这些城堡还不完全具备国家的性质。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则已经属于国家范畴。夏、商的迁都就是迁国。周族发展史上，先是在本土“作邦”、“作邑”，形成周人的国家，灭商后又派周人向外殖民“营国”，划分国野，建立了众多诸侯国。周代的天下，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封国，许多封国也有过迁徙的历史。从现象看，这与古希腊的城邦相似，有人也称其为“城市国家”。但它与古希腊的城邦有重大区别。古希腊的城邦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不存在统辖各城邦的共主，就是那些二次殖民“分裂繁殖”建立的城邦，与母邦之间也没有宗属关系。而周代诸侯国与周王室的宗属关系是有制度规定的，即便到了王室衰落以后的春秋时代，霸主们也不敢否认从属于王室，只能打出“尊王”的旗帜号召天下。此外，古希腊的城邦由城市和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地区组成，农业远不如手工业和商业重要。而周代的封国是由城市和周围广大的乡村地区组成，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主要为贵族生活服务，商业很不发达。直到春秋时期，城市仍主要是作为政治和

军事中心存在，经济上的意义是微小的。只有到了战国中期，经济都会才蓬勃兴起，而那时已经是地区性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古代社会行将结束的时代了。依照性质来说，中国古代国家特别是周代的封国，称为宗族国家比称为“城市国家”更为恰当。

还有一个财产问题，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明显特点。恩格斯认为，私有财产缺乏是理解东方古代社会的钥匙，确是十分深刻的见解。我们不清楚远古希腊的财产制度，但已经知道自公元前2000年代末向海外大举殖民时起，移民团体总是把夺取的或开辟的土地分给它的各个成员，土地便成为个人私有财产。中国的情况不同，三代王朝声称天下土地人民为天子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分封制度下，天子把土地、人民分配给诸侯，诸侯又分配给大夫和士。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个人的财产私有权，只有财产占有权和使用权。私有财产发展是古代社会不可改变的发展趋势，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朝这个方向的发展是极缓慢的，以个人财富取得社会地位的国民阶级经过漫长的道路才逐渐形成，而且始终没有达到充分壮大的程度。人们常把商鞅变法与梭伦变法作比较，认为在承认私有财产合法化上两者是一致的。但商鞅变法比梭伦变法晚三个世纪，后者发生于古希腊城邦形成阶段，前者发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地区性中央集权国家形成阶段。更不要说商鞅变法还没有像梭伦变法那样明确规定，依个人收入多少划分社会等级，依财产多少确定各等级的权利。中国古代私有财产的缺乏，自然与氏族制度残余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有关。

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二千年独立发展过程，它活动的地理舞台之广阔在世界各古文明中首屈一指，留传至今的历史资料之丰富是其他古文明无法比拟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意义不应限于为已有的关于人类古代社会规律的认识提供更多例证，理所当然地应该丰富发展已有的认识。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见解，认为古希腊只是人类古文明中的一个特例，中国古文明在人类古文明中更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即便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也不能不重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以一般规律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

三、文献和考古资料

先秦文献资料基本可分六类。

一、政治文诰汇编——《尚书》和《逸周书》。

《尚书》也称《书》、《书经》，记载尧、舜至秦穆公时的史事，分为虞、夏、商、周四个时期。自汉代起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分。《今文尚书》是汉初人伏生传授的，共28篇，武帝时又出现《大誓》1篇，共29

篇。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故称《今文尚书》。西汉中期开始，先后出现过几个用先秦文字写的《尚书》传本，称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中都已失传。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賾又献出一部《古文尚书》，经后人考证为伪书，称为《伪古文尚书》。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合编本，其中《今文尚书》以外的25篇取自《伪古文尚书》，一般不作先秦文献对待。

据说《逸周书》是孔子编订《尚书》时未编入的周代文献。《汉书·艺文志》说《逸周书》共有71篇，而汉代就只存45篇了。今本《逸周书》却仍有71篇（其中11篇有目无文）。今本的来源，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中考证，是东晋初李充编订的，其中包括汉代传世的45篇和《汲冢周书》中的一部分，还有《序》一篇及西晋孔晁的注。

二、礼书——《仪礼》、《礼记》和《周礼》。

《仪礼》也称《士礼》、《礼经》，共17篇，是战国儒家学者编集的记载周代礼仪规则的书。古代礼的应用范围很广，凡即位、出境、朝聘、会盟、出师、狩猎、宴会、祭祀、婚嫁、出生、成年、丧葬都要举行制度规定的仪式，仪式要遵照一定规则进行。据说西周时的礼仪规则大条目三百，小条目三千，《仪礼》记载的当属其中一部分，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

《礼记》，即《小戴记》，共49篇，西汉今文经学家戴圣编订。内容为孔门弟子讨论礼的意义和行礼规则的记录，包括通论礼的意义、解释《仪礼》、记载孔子言行、考证古代礼节制度、记载古代格言等部分内容，对于研究古代社会和儒家学派都有重要价值。《汉书·艺文志》中礼类有《记》131篇，加上同类其他著作83篇，共214篇，《小戴记》当选自214篇。另外，有戴圣之叔戴德的选编本，称《大戴记》，共85篇。

《周礼》，也称《周官》、《周官经》。推测为先秦儒家学者采集周、鲁、宋等国官制编辑而成。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西汉时《冬官》一篇已佚，补入《考工记》顶替。内容综合了西周至春秋时的官制，杂有战国时人的观念。《考工记》还载有先秦手工业操作规程。《周礼》来源说法不一，历来有激烈争论，但对研究先秦官制仍有一定价值。

三、诗歌集——《诗》，也称《诗经》，是西周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共305篇。分三部分：《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陈、魏、唐、秦、桧、曹、豳15个地区的民歌；《雅》105篇，是周人传统的乐歌；《颂》40篇，是贵族在典礼上歌颂祖先的乐歌，包括周人和商人后代的作品。《诗经》中反映民间生活、贵族生活和商、周祖先传说的内容都有很高史料价值。西汉时有四家诗，属于今文派的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失

传，属于古文派的毛诗流传至今。

四、史书——《春秋》经传、《国语》、《纪年》和《世本》。

孔子依据鲁国史官记载编订的《春秋》，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史事，极为简略。战国儒家学者作传解释者不少，曾出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邹氏传》、《夹氏传》。后二书失传，前三书流传至今，称《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今文派，专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价值主要在思想史方面。《左传》重在记述史实，内容之丰富为先秦史书之首。《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历来有争论，但其史料价值极高是无疑的。

《国语》分别记载周、鲁、齐、晋、楚、郑、吴、越八国史事，共21篇。记事起周穆王至三家分晋，以春秋时期为主。《国语》记各国史事详略悬殊，将周与诸侯国并列，有些言论与儒家观念不同，均说明它存在某些复杂情况，有些记事可以与《左传》比照研究。

《纪年》即《竹书纪年》，13篇，西晋汲冢战国墓中出土的竹书的一种。记事自黄帝至魏襄王20年（公元前299年），长达两千余年。其中西周灭亡后下接晋国，三家分晋后下接魏国，当为战国时魏国史书。北宋末这本《纪年》失传。《今本竹书纪年》经研究断为伪书。清代学者从古籍中辑出的佚文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纪年》面貌，称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竹书纪年有多种，以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较为完备。方诗铭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是现有最好的辑本。

《世本》是一部资料汇编，包括帝系、本纪、世家、传、谱、姓氏、居、作、谥法等部分。记事详于春秋以前，有部分战国资料，个别涉及西汉，估计为战国时赵国人编，汉代人有所补订。《汉书·艺文志》记载，《世本》有15篇，至唐代已残缺，宋代全部失传。清代以来辑出多种辑本，今有《世本八种》收集了主要辑本。

五、《周易》，也称《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形成于西周初年，为占卜用书，由64卦符号和卦、爻辞等450条文字组成。卦爻辞涉及的殷周之际史实，有些不见于其他资料，久为人们遗忘，值得研究发掘。《易传》是解说《易经》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时期，共有《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合称“十翼”。《易传》富有哲理，价值主要在思想史方面。

六、先秦诸子著作。主要有《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公孙龙子》、《商君书》、《韩非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史部杂史类的《战国策》，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言行汇编，

保存了纵横家的资料。先秦子书都成书于战国时期，诸子著书宗旨在论证各自学说，价值当然主要在思想史方面，但其中多涉及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在社会史研究方面也有一定价值。

除以上六类之外，还有一些文献形成于后代，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资料。这类文献中首先是《史记》中的先秦部分，为司马迁依据先秦史料所作，最为系统完整。其次是《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前二书记吴、越、楚三国史事，多有传说异闻。《华阳国志》为东晋人撰写，记远古至东晋巴蜀史事。再次，三国时人编著的《古史考》专补《史记》记先秦历史之缺，南宋人编的《路史》广收远古传闻，清代人编的《绎史》汇集上古至秦代史书旧文，均可参考。

考古资料即考古发现和传世的历史遗迹、遗物，包括居住遗址、墓葬、建筑、工具、器物、钱币等。它们对先秦史研究特别重要，这是因为：考古资料是文字出现以前那个时代留给后代的惟一历史资料；先秦形成并留传至今的文献有限；有限的先秦文献流传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改变，而考古资料涉及时间更长，涉及社会生活更广泛、更具体，千万年来埋藏在地下而不存在被篡改的问题，有无可辩驳的可靠性。

有两部图书包括着先秦考古资料的全面介绍，对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一部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另一部是《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综述1949年至1979年间我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再如国家文物局主编的大型图书《中国文物地图集》，全面详备，使用价值颇高。这类图书可供概括了解有关考古资料。若要进一步了解某个方面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则需阅读有关专门著作，如贾兰波著《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国旧石器时代》，安志敏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等，还有已发表的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和大量专题论文。

带有文字的遗物即古文字资料，是考古资料中特别重要的部分，主要有甲骨文资料、金文资料、刻写在石质材料上的古文字资料、简牍帛书文字资料四类。封泥和陶文，因多为个别单字单词，价值在上述四类文字资料之下。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甲骨，总数达15万余片。著录很多，以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最为完整。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带字的289片，是现有的殷墟甲骨文以外的惟一成批的甲骨文资料，在徐锡台编著的《周原甲骨文综述》中已全部发表。金文是铸或刻在商周（包括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器物上的铭文。商代金文字数很少，每篇最多数十字，西周以后金文多有百字、数百字的长文，《毛公鼎》铭文496字，为金文篇幅之最。金文在研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商周制

度、思想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的《金文集成》已陆续出版，提供了最完整的金文资料。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徐中舒的《殷周金文集录》分别收录解放前和解放后发现的主要铭文，可满足一般需要。刻写在石质材料上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鼓文，石鼓是春秋时秦国文物，共10件，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国君出猎活动。郭沫若著有《石鼓文字研究》。另一种是侯马盟书，用毛笔书写在玉石片上，共5000多件，记载春秋晚期晋赵鞅与卿大夫的盟誓，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整理成《侯马盟书》一书出版。现有先秦简牍文字资料均属战国时代文物，出土于湖南长沙、湖北随州和江陵、河南信阳、四川青川等地。其中随州曾侯乙墓的竹简为姬姓国文物，青川木牍为秦国文物，其余皆为楚简。简牍文字内容有书籍、法律文书、占卜、遣策（随葬品登记簿）等。这些材料多已在相应的发掘报告中发表。已发现的先秦帛书文字资料只有一件，就是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发现的楚帛书，计900余字，可能是战国数术性质的佚书。此外，秦汉考古发现的几批简牍和帛书文字资料中，有多种先秦书籍抄本，这里不作介绍。

四、本卷编写工作

这本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第一卷，在《中国历史》总主编张岂之先生指导下编写。1995年春天，张岂之先生开始组织一些同志研究国内解放前后和国外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考虑如何吸取它们的优点，编写新的中国历史教材。当时大家交换了意见，并把一些看法在《华夏文化》杂志发表，就教于同行学者。接着，张岂之先生提出《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初步意见》，全面系统地说明了他对全书的设想。我们编写先秦卷的同志则依据总主编的设想拟出两份先秦卷提纲草稿。1995年7月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历史》编写工作会议上，讨论了我们的提纲，专家们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会后又几经修改确定了章节目录，开始编写工作。到现在为止，我们用了三年多时间，写完了《中国历史·先秦卷》。这里就本卷体例、内容和吸收新成果三方面的问题略作说明。

在体例方面，本卷首先遵循总主编提出的全书的共同原则，主要是：世系和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将历史发展主线索叙述清楚；制度与人物活动结合，不专写人物传记；文化与社会生活结合，反映社会面貌；注意重要历史内容的前后演变。其次，放弃了以社会形态为题分编分章的做法，尽量以中国先秦历史的概念术语作编和章节题目。这样做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在题目中反映中国历史的具体内容，使其与社会发展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取得共识。我们宁愿努

力写清先秦历史的基本事实和发展过程，把分期问题留给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讨论，这样处理或许可使教材适应面更大一些，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放弃社会发展史的社会形态观念。再次，本卷仍采用章节体例。但为了避免内容过于分散，部分章节的内容仍有些上溯下沿，在章节体例中这样做应该是允许的。

在内容方面，总主编提出先秦卷要突出四个重点：中华古文明的交流融合；中华民族的形成；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发端；中国学术文化的起源。突出这四个重点既切合中国先秦历史实际，又适应当代时代需要，所以，先秦卷在内容安排上努力体现这些要求。分别来说，在第一编里着重以考古发现和传说史料叙述了中国文明起源期各文明发源地区的特征和相互影响。在第二编里注意说明夏、商、周三族起源和融合发展过程。在第二、三编里介绍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占了最大分量。有关商周王权发展、分封制度、郡县制度、国家机构、兵制军制、工商制度的章节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另外还设立两个专章（第二编第四章、第三编第五章）叙述社会生活，对社会组织的特点和日常生活作了说明。在第二、三编里还把宗教思想和诸子学说作为重点，力图勾画出先秦学术文化从巫术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人文文化的发展线索。

在吸取新研究成果方面，我们遇到一定困难，即先秦史上的很多问题都有争论。可以说新见解很多，公认的却很少。我们既不能在教材中一一罗列各种新见解，又不能任意取舍，只能从对先秦历史的总体认识出发有选择地反映新的重要研究成果。例如：一、在中国国家起源途径问题上，我们吸取了一些学者提出的“首邦”说、“邑群”说及强调早期国家“公众性”职能的见解。这些新成果都与国家因素在氏族内部成长发展起来的理论一致。二、在商周国家形态问题上，我们吸取了“宗族国家”的见解，这种见解强调国家与家族混合、君统与宗统统一，说明了商周国家将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特点。三、在商周家族形态问题上，我们吸取了商周社会基层单位为家长制家庭公社、父系家族公社的见解。这两种见解都认为商周社会氏族组织继续普遍存在，直到春秋战国才从动摇走向瓦解。四、在土地制度问题上，我们很注意商周贵族以“指定服役制”方式进行剥削的见解以及对“贮田”意义的发现。“指定服役制”说明古代农业劳动是集体劳动，不存在小块土地私有制；“贮田”是收回分封土地改封给另外的贵族，这正是土地王有制的表现。

本卷由四位同志执笔：前言、第一编、第二编第一章、第三编第一、四、六章由西江大学刘宝才执笔；第二编第二、三、四章、第三编第二、三、五章由西江大学周苏平执笔；第二编第六章、第三编第八章由清华大学廖名春执笔；第三编第七章由清华大学钱逊执笔；第二编第五章由廖名春、刘宝才共同执笔。

最后要着重说明，本卷是在总主编张岂之先生主持下完成的。同时承我国

著名历史学家吴荣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林甘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对本卷进行审稿，给本卷编写以很大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